

渝北文史資料

第四輯

(总第十三輯)



百萬雄師抗洪魔
滄海橫流
英雄多驚濤危
霞紅星在險
堤決時綠衣蹕
心心牢繫成
衆志手手緊携
起山河中坐
民族孰可勝
入挽長江奏凱
歌

戊寅夏 曹祥明詩并書



渝北文史资料

第四辑

(总第十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重庆市渝北区委员会 文史学习委员会编印

一九九八年十月

封面题字 王俊

封面书法、篆刻 曾祥明

封面设计 曾祥明

渝北文史资料
第四辑(总第十三辑)

重庆市渝北区文化局准印通知号码 018931

开本 850×1168mm 1/32 字数 16.2 万

印刷 重庆市渝北区彩印厂

时间: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工本费 10.00 元

前 言

一年一度秋风劲,又到桔红橙黄稻翻金的丰硕季节了。

今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发展,对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端正,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不可估量的伟大影响。为此,我们在这一辑文史资料中,专门开辟了“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 20 周年”的栏目,收集到的 6 篇文章,有的是当年“拨乱反正”形势下的发言和通讯,它们作为历史的见证,反映的“左”倾路线对江北县的危害和粉碎四人帮后平反冤假错案、发展生产力,给江北县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从而窥斑见豹地认识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有的是在平反冤错假案中当事人的亲历史料,从而可以看出“左”倾路线对干部职工的残害和对人们思想的严重束缚;有的记录了三中全会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江北县农村所带来的巨大变化。这些史料,都如一面可以知兴衰、鉴得失的明镜,为我们党和各级领导干部在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中引为殷鉴,以使历史的悲剧不复再度重演。

“建国后史料小辑”是我们坚持了数年的重点栏目,本辑中所收录的 12 篇资料,记载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在江北县发生的种种悲剧、闹剧和喜剧,使我们看到前进中的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此外,“专题搜访”栏目中《洛碛镇历史沿革名称变易补遗》等三篇资料,都是老耆宿、老江北县人精心搜集和整理的可贵史料,其中部份内容,已刊登在《重庆晚报》“史林”专栏中。“文化杂俎”中《巴人祖先廪君和巴文化琐议》是一篇难得

的研究性资料,作者作了认真的探索与分析,颇堪一读。

细心的读者还可能发现,我们的《渝北文史资料》从本辑起,面目一新了。它由小 32 开本变成了大 32 开本,在装帧、印刷上都有了大的改观。这是区政协领导对文史工作的更加重视、关怀,广大文史工作者、爱好者更加努力的共同结果。我们希望,今后的《渝北文史资料》在领导和作者、读者的继续关注下,不仅从装帧上,而且从内容上都发生更大变化,以使《渝北文史资料》更美、更好。

继续征集辛亥革命以来的文史资料,加强对建国后史料的征集、编辑、出版,仍是我们的重要的和日常的工作。盼关心《渝北文史资料》的有识之士,多给我们撰写稿件和提供线索,特别是弥补我们在经济、科技、港澳台等资料上的不足。

明年,是人民政协成立 50 周年,建国 50 周年,澳门回归结束殖民统治之年,世纪之末之年。更盼大家踊跃赐稿,以使我们把本世纪的最后—本《渝北文史资料》办得更加丰富多采,以新的步伐跨入新的世纪。

重庆市渝北区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
一九九八年十月

本辑编校

编 审 王 俊 王天寿

副 编 审 曾祥明

责任编辑 曾祥明

编 委 王 俊 周白照 范泰枢 周志杰

邹元良 陈尚洁 曾祥明

校 核 周白照 周志杰 陈尚洁

曾祥明 李 静

政协渝北区第十一届委员会 成员名录
文 史 学 习 委 员 会

主 任	曾祥明			
副主任	刘茂文	曹延华	匡 明	
委 员	王晓玲	方 鉴	刘明良	向大柱
	李永雄	李家骥	牟海惠	何 峰
	何晓容	张兴莲	张知学	张定年
	张明祥	周祖梅	黄承碧	彭子健
	惠 钊	蒋合林	裴启文	曾明正
	王 俊	陈尚洁	周白照	范泰枢
	周志杰	邹元良	杨贵才	唐荣国
	陈儒文	张宣富	吴丙然	傅恒模

通讯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渝航路 127 号

邮政编码:401120

电 话:(023)67826442

渝北文史资料第四辑

(总第十三辑)

目 录

·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 20 周年·

坚持实践标准 正确认识阶级斗争

..... 王 俊 李效容(1)

付出昂贵代价的经验教训

——江北县开展阶级斗争的得和失

..... 杨志高 杨本良(9)

江北县文教界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

分子政策的概况 王 俊(18)

落实“右派”政策的前前后后 李朝文(24)

忆江北县卫生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 陈永仲(30)

改革、开放的春天

——回顾渝北区 20 年来的农业和农村改革

..... 杨贵才(35)

·建国后史料小辑·

江北县解放后首次集中教师学习记略 陈尚洁(43)

江北县的反右斗争 陈雨人(57)

“大字报”放“卫星” 邹元良(64)

亩产 10 万斤的“大卫星”坠落记 刘政权(68)

我所经历的几个公共食堂 周志杰(76)

江北县“大办钢铁”简述 刘世源(80)

江北县三年旱灾琐记 张则之(84)

人民公社时期四川省田坎下户第一村

——省地委工作组在兴隆公社火炬大队

- 田坎下户试点情况 杨贵才(93)
- 对江北县“纠右打资”运动的回顾 彭仲猷(99)
- “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次历险记 周志杰(105)
- 我上北京“大串连” 朱长举(109)
- 移风易俗 推行火葬
- 渝北区殡葬改革发展回顾 杨德安(113)

·专题搜访·

- 洛碛镇历史沿革名称变易补遗 周白照(119)
- 民国时期江北县中统特务组织的由来和历史罪行
..... 王远富(127)
- 江北县治变迁及发展漫话 张则之(132)

·经济纵横·

- 解放前江北县区乡田赋粮食管理处征收处设置
情况简记 杨秀明(142)
- 话说轿子、滑竿、溜溜马 邹元良(144)
- 杂记轿子滑竿 周白照(149)

·人物春秋·

- 回忆民智校和周凤梧老师 周志杰(153)
- 抗日时期破一项陪都田径纪录的童明禄 杨贵才(161)

·文化杂俎·

- 巴人祖先廪君及巴文化琐议 田大文(165)
- 铁山战歌 龙世孝(178)
- 江北县及渝北区获全国奖的文艺演出节目和作品
..... 王德富、文史办(188)

·资料拾零·

- 永庆乡地名的由来 刘建仁(192)
- 江北县参议会成立贺联 张则之辑(193)

坚持实践标准 正确认识阶级斗争

王 俊 李效容

编者按:这篇文章以谈“阶级斗争”为由,实际批判了“阶级斗争为纲”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和对干部、群众的戕害。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政治路线上进行拨乱反正的大问题,即由重点抓阶级斗争转移到抓经济建设。可惜,这个转移被耽误了二十年。这是一面历史的铜镜,映出了违背实事求是所造成的悲剧。为了保存历史的本来面目,刊发时未作更动。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这对于在党的领导下端正思想路线,维护安定团结,实现工作重点转移,有着重要意义。一年多来,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学习讨论,联系我们江北县三十年来抓阶级斗争的实际,逐步获得如下一些认识。

在过去三十年中,我国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但它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处的地位、作用有所不同。这就是要求我们对每个历史阶段的阶级状况有正确分析,对阶级力量的对比有正确的估量,从而在阶级斗争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政策。建国三十年的实践说明,当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阶级斗争问题时,革命就前进,生产就发展;反之,生产力就遭破坏,造成政治上、经济上的严重后果。

第一,当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时,就应该着重去抓阶级斗争,同时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以推动社会前进。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才能推动社会前进。在新中国建立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他们是反动没落的生产关系的代表,严重

地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当时的主要矛盾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和三大敌人的矛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推翻三大敌人,解放生产力。新中国建立后,我县与全国许多地方一样,阶级敌人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继续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旧的生产关系仍然严重地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在此情况下,我们就是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主要矛盾,以扫清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我县在 1950 年到 1956 年这七年中,由于贯彻执行了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所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按照当时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开展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斗争,彻底消灭了封建主义所有制,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又基本上改造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这就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我县工农业生产年年稳步上升。1956 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五亿三千万斤,比解放初期增长 65%;林、牧、副、渔和其它各业也都有很大发展;工农业总产值由解放初的六千二百多万元上升到一亿二千多万元。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利用他们篡夺的部分权力,对全国人民搞封建法西斯专政,他们是反动阶级的代表,我们和他们的斗争是社会主义时期特殊情况下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后,我们狠抓了揭批林彪、“四人帮”这个主要矛盾,有效地清除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加上其它方面的工作,全县迅速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77 年,全县粮食总产四亿七千万斤,比 1976 年增长 18%,1978 年,达到六亿二千万斤,比 1977 年增长 35%,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历史的经验说明,当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时,就应该着重抓住阶级斗争,并按正确的政策开展斗争,这样才能取得工作的胜利和生产的发展。

第二,当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时,如果以“阶级斗争为纲”,必

然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伤害好人。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如1956年“八大”决议所指出的:“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阶级剥削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当然还存在着阶级斗争,但已不是主要矛盾。“八大”根据当时变化了的阶级状况和社会主要矛盾,提出党的主要任务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1957年2月,毛主席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总题目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目标是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可是二十多年来,我们偏离了“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和毛主席这些指示的精神,无视已经变化了的阶级状况,仍然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矛盾来抓,这就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伤害了不少干部和群众。1957年,对极少数右派进行斗争是必要的,但却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唯心的估量,过分夸大了他们的能量,不恰当地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右派运动,而且作法也很错误,如放长线钓大鱼、引蛇出洞、层层扣比例、把在党的会议上正常地提出来的意见也作划右派的依据等等。我县在整风反右中被批判处理的干部(包括农村基层干部)达2,256人,占当时干部总数的15.2%;其中划右派529人,中右和反社会主义分子360人;作了处理的965人,占干部总数的6.5%。在科局长以上干部中抓不出右派,最后找都要找一个出来。现在绝大多数已作改正。这个运动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混淆了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破坏了党风民主和人民民主。特别是把一些诚心诚意地帮助党整风、向党提意见的同志打成右派,政治上影响

极坏。反右过后，“不说话”成了群众总结出来的教训！

1958年，在党中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不过，同时也有不少瞎指挥的情况，违背经济规律，给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许多困难。干部、群众因此提出疑问、责难和改进意见，本是可以理解的。但在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的估量下，1959年以来的反右倾运动中，却把党内意见分歧统统当作阶级斗争的反映，把不少干部、群众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时我县被批判、处理的干部达1,300人以上。使干部元气大伤，积极性遭到严重挫折。

在剥削阶级已经基本消灭的情况下，为了坚持“阶级斗争为纲”，还乱立标准，重划阶级，把一些干部、群众打成敌对阶级分子。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划分阶级的标准只能是人们在社会经济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但我县在1957年后的历次运动中，为了寻找敌对阶级，却把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生活富裕程度、某些适应于现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特殊经济管理方法等都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分别给干部、群众戴上什么“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新地主”、“新富农”等帽子。计历次运动中被定为敌我矛盾的干部就有531人，占干部总数1.5%，而且重则法办，轻则开除党籍、撤职。例如石鞋公社，1964年搞“四清”试点时，生产队长以上干部326人，就处理了126人；该社天泉大队支书石吉成家庭劳动力强，工分多，生活较富裕，就由贫农上升为新富农，把他家的一间半房子，价值八百多元的家产，象打土豪分浮财那样分光了；金刚大队七队队长邓国章，由中农上升为新富农，不仅财产分光，人也被七斗八斗斗死了；全社社员正式上升成份的有28户（已改正），因怕挨整而自杀的有8人。

与此相联系的是大搞“血统论”。把剥削阶级出身的干部、知识分子、农村的地富子女作为打击对象，其中有的上升了成份，有的带上了阶级敌人的帽子。全县历次运动错定地、富、反、坏分子1,100多人。

文化大革命中,我县教师队伍中因历史问题、家庭出身问题被戴上反革命、地富分子帽子而被审查批判的,有 500 多人,开除约 60 人。

第三,当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时,如果以“阶级斗争为纲”,必然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破坏生产力,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

当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新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既相适应又相矛盾,而适应是主要方面。因此,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已成为我们的主要任务。毛泽东同志当时曾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八大”一次会议和二次会议也分别作了决议,要为建设一个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宣布了全党全国中心工作的转移。近二十年间,我们本应按照“八大”的要求,在新的生产关系下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由破坏一个旧世界转向建设一个新世界,由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转而向地球开战。但是,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我们没有这样做,而是继续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上大做文章。

1958 年,为了搞生产上的大跃进,过早地实现了人民公社化;1959 年,“三高”、“五风”仍继续蔓延,生产连续下降;加上自然灾害,1960 年初肿病大量发生。问题暴露后,从上到下不是实事求是去分析,反而把“三高”、“五风”促成的恶果归结为“地主阶级复辟”、“没有抓好阶级斗争”。当时分析我县落后的原因有两条:一是江北县是国民党的模范县,残渣余孽多,民主革命不彻底;二是右倾根子深,时间长,纠正慢,右倾倒退严重。为此,各级党委连续大批地派工作团、队、组来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进行“民主革命补课”,改造三类社,搞夺权斗争。1959 年至 1961 年,仅三个年头,全县就陆续搞了“反右倾”、“整风整社”、“纠右打资”、“拔白旗”、“反瞒产”、“火线整风”、“突击落后”、“整党整社”、“农村三反”等运动。这一时期被批

判、处理的干部占干部总数 53.65%，处理面达 14.5%。为了把“民主革命”搞“彻底”，切实纠正“右倾倒退”，还提出了对敌阶级分子实行“政治上打垮，经济上挖空”的口号。搞得干部、群众人心惶惶，生产遭到极大破坏，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以至风调雨顺的 1960 年减产二亿多斤，1961 年更下降到八千万斤多一点。三年中，因肿病而死的人很多。这是用血换来的沉痛教训！1963 年到 1965 年，又搞“三反”、“面上社教”、“小四清”、“大四清”等运动，仍以“民主革命不彻底”、“右倾倒退严重”为由，把农村中经营管理、干部作风、生产技术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都归结为“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要“重新组织阶级队伍”。这段时间，批判、处理的干部占 23.4%。这样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越补问题越多，越补人与人的关系越紧张，越补干群的生产积极性越低，越补生产越下降。

为什么要无休止地大搞政治运动，使农业生产长期上不去？根本的原因是多年来总是强调一个“斗”字。斗什么？资本主义。真的是斗资本主义？否！实际情况是：

一方面，把适应社会主义现阶段经济关系的自留地、集市贸易、家庭副业都作为资本主义尾巴来割。1958 年建立公社后，刮共产风，搞穷过渡，取消自留地和集市贸易，吃亏不小。以后虽然陆续作了一些纠正，但总是从性质上把这些必要而合理的经营管理方式当成资本主义来批。如 1962 年大批“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由经营、包工包产），“四清”中大批右倾倒退。到了文化大革命，“四人帮”乘机破坏，在他们的“全面专政”口号鼓动下，更把这些作法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大张挞伐。这些经营管理方式的性质，直到三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下达后，才弄清楚了，才作为党的政策得到切实执行。实践证明，当这些政策遭到破坏的时候，生产力就受到破坏，农业生产就下降；反之，生产力才能发展。

另一方面，把属于公社经营管理上的自主权和生产上的责任制的一些作法，作为集体内部的资本主义来批。生产队要因地制宜种

作物吗？不行，这是“自由种植的资本主义”。要提高农活质量，搞分组作业、包工到人吗？不行，这是“右倾倒退”。要搞包工包产到组、单项农活包到人吗？这就更不行了，是“单干”。1960年，我县只是搞了“四固定”作业组，就受到批判，干部层层检讨；至于包工包产，则更是谈虎色变，多年来已成为禁区。到了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蓄意破坏，把我们的错误推向极端，按劳分配被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在“富即资”，“富即修”的错误观点影响下，劳动力强，工分多，家庭副业搞得好的社员，被作为“暴发户”加以批判；生产队办工、副业为集体多挣钱，被斥为“以钱为纲”的资本主义；集体增了产，分粮超过500斤，也被斥为资本主义；社员和生产队的农产品在完成国家计划的情况下进入集市贸易，更是资本主义，如此等等。

林彪、“四人帮”还有意地把阶级斗争夸大到无比激化的程度。他们捏造阶级关系新变化的理论，大抓走资派，大搞全面专政。县革委成立后，所搞的“清队”、“一打三反”、“整党”、“批清”、“整顿财贸队伍”等运动，都严重地颠倒了敌我关系，被批判、处理的干部占20%以上，使农业生产遭到全面破坏；1976年和1966年比，粮食总产量减少一亿四千万斤，生猪减少三万头。1958年前，全县森林面积四十六万亩，蓄积木材一百万立方米，每年可伐三万立方米，除自给外，还可调出一万立方米。由于1958年的乱砍、滥伐和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破坏，1976年仅有幼林二十万亩，每年要调进木材六千立方米。由于森林面积缩小，造成水土流失，气候发生异常变化，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综上所述，1957年以后，由于没有妥善地估量、对待阶级斗争问题，大搞人为的阶级斗争，片面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政治运动不断，尤其是林彪、“四人帮”乘机制造的空前浩劫，结果严重伤害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元气，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致使全县人穷财空，在较长时间内完不成国家对农产品的征购、派购任务，年

年闹春、夏荒,靠吃返销粮过日子,甚至连简单的再生产也无法维持,成了全省的落后县。

粉碎“四人帮”后,通过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拨乱反正,我们党自己又纠正了过去的错误,才扭转方向,促进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县大力贯彻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使农村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真是三年三大步,生产步步高。1979 年粮食总产达六亿八千万斤,首次跨《农纲》。同时,林、牧、副、渔各业也有所发展,蚕茧达二百七十二万斤,比 1978 年增加 25%;生猪圈存达四十七万多头,比 1978 年增加 32.8%;社队企业总产值比 1978 年增长 10%;人平收入增加 20%。

历史是一面镜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县的经验教训说明,科学地、如实地分析和估量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状况,正确处理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阶级斗争客观存在,不抓是错误的。当前的问题不是抓不抓阶级斗争,而是如何从具体情况出发,正确地抓,妥善地、恰如其分地抓。绝不能无视已经变化了的客观实际,再搞什么“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那一套。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论断,既反对阶级斗争熄灭的观点,又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明确指出今后不再搞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了。这是走了漫长的弯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得来的经验总结,是完全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是完全符合现阶段斗争的实际情况的。

·原载《重庆师院学报》社科版 1980 年 2 期·

(王俊,原江北县政协主席,当时是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效容,原江北县委宣传部干事)